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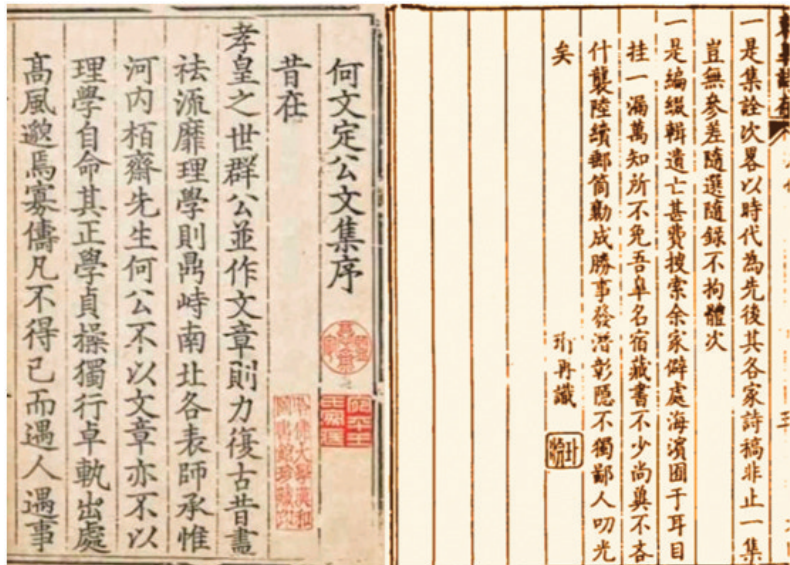
# 《东皋诗存》为何未收何塘的作品

◎徐继康

海陵旧话

学者认为汪之珩在编刻《东皋诗存》时偏偏遗漏了明代著名理学家何塘的诗，是一大失误。但最根本的原因很可能是汪之珩当时没有找到何塘的诗集。

►《何文定公文集》与《东皋诗存》书影



清中期南通州学者杨廷撰一生致力于乡先辈诗文轶事，著作宏富，其中《一经堂诗话》对前贤时有点评。他在评述汪之珩征辑《东皋诗存》时这样写道：“璞庄汇四代以来诸作者，编成四十八卷，厥功甚钜。第歿后，其书始出，故挂漏亦所不免，如何柏斋，理学名儒，其诗见朱竹垞《明诗综》，而集内不收。撰辑‘耆旧’诗，于是书甄录颇多，补正处间参鄙见，鑿之枘之，要与先生同一关捩也。”杨廷撰说，当年汪之珩在编刻《东皋诗存》时，偏偏遗漏了明代著名理学家何塘的诗，绝对是一大失误。《东皋诗存》是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汪之珩收集自宋以来皋邑前贤及今之已故旧游时流的诗编刻而成的，搜罗诗人四百六十九家，诗七千一百八十首，共四十八卷，可以说是如皋地区从宋至清这八百年间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然而，我们翻看《东皋诗存》时，确实发现没有收录何塘的诗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何塘是明代大儒，也是一代名臣。他字粹夫，号柏斋，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，二十七岁的他中河南乡试第一，次年会试中进士为庶吉士，从翰林院编修开始，历工、户、礼三部侍郎，一直累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而致仕，去世后追封为礼部尚书，谥“文定”。他一生笃行励志，论学一以格致为宗，在阳明心学流行的时代，他独以躬行为本，若论笃实，乃在讲学诸家之上。他一生著作颇丰，如今世人所熟知的那句“子孙胜似我，要钱做什么？子孙不胜我，要钱做什么”就出于他之口。

汪之珩没收何塘的诗，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关于何塘的籍贯问题。其实何塘的籍贯并不在如皋，而是河南武陟，这在《明史》《四库全书》一直到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都如此记载，何塘本人也是这么写的，如皋仅是他的祖籍而已。何塘在《何氏家谱》的序文中说：“何氏之先为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江宁乡十五都何家堡人，谱亡世次无考，自塘高祖忠一公国初以从戎始迁怀庆，故今为怀庆人。”

何塘的高祖何忠一，明初从戎，

北定中原后，遂编怀庆卫籍，擢红旗头目，屯田武陟千秋乡之头铺营，自此定居怀庆。何塘曾祖何贵、祖父何滨、父亲何森都一直生活在那里，母亲刘氏也世为怀庆卫人。成化十年（1474），何塘出生于怀庆的武陟小何井，次年迁居何家营。七岁时，何塘随家迁入怀庆府城内。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九月十三，何塘病故，终年七十，葬在怀庆府城南门外何家祖塋。何氏居怀庆已历五世，何塘本人也以怀庆卫籍应试，说他不是如皋人，应该毫无疑问。汪之珩是否凭此而不收其诗？

何塘算不算如皋人？从嘉靖三十九年的《如皋县志》开始，其后差不多每一部“县志”都收录了他，不管是《选举制》《儒林传》，还是《艺文志》，均注为“河南怀庆卫官籍”，说他“世为江宁乡十五都何家堡人”，说明如皋人历来都认可何塘就是如皋人，并一直引以为荣。至若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记载他为掘港场人，倒不知所依何据。

在《东皋诗存》的卷一，我们发现收有孙应鳌的诗，而孙应鳌的身份与何塘一样。他先祖孙华原籍如皋县燕庄，以南京神策卫千户于明洪武年间到贵州任龙里卫总旗，后升副千户，驻清平，世袭其职，遂家于斯。其后，从孙礼、孙铎、孙瀚、孙重、孙衣到孙应鳌都是清平卫籍。孙应鳌也是中解元登进士为庶吉士，一直做到礼部尚书，去世后谥“文恭”。与何塘一样，历代《如皋县志》也列孙应鳌于其中。《东皋诗存》收他的诗，足有九十三首之多。

同样的身份，不同的待遇，不由让人疑窦丛生。有人说，孙应鳌与如皋往来密切，从他的诗里，可以看出有如皋及江海的行踪，如《东皋山堂》《海上行》《访五山读书胜寿禅林》等，他号淮海，说明他对祖籍念念不忘。甚至有资料说，他去世后，元配夫人李氏回葬如皋，他们生前抱养三子，其中就有二子回到如皋。而何塘对如皋，既不见诸文字，又不见于行踪，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可言。

何塘有一篇《朱二尹致仕序》，

为一位武陟县丞退休时写的序文。朱二尹是南通州人，故何塘写道“塘原贯泰之如皋，与先生为同乡”。当初朱二尹新上任时，何塘便急急匆匆去拜访他，并告之“五月九日，火星用事，不利居官”。如果不是心理上特别亲近的人，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究其原委，就是这位朱趾斋先生是南通州人，是他的同乡。可见何塘一直把自己视为如皋人，对如皋是充满感情的。

《东皋诗存》没有收何塘的诗，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当时没有找到何塘的诗集。有一个佐证，汪之珩去世差不多四十年后的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编纂《如皋县志》时，在《艺文志》中仅收了何塘的一篇《论民财空虚疏》，没有收他的诗，却收了孙应鳌的好几首。论其原因，他们应该也没有找到何塘的诗。何塘著作虽丰，明代刻有《何文定公文集》《何柏斋文集》《何粹夫集》《柏斋集》等行世，但文多诗少。说起他的诗，他曾在一篇自序中说“顾以方事举业，力不能兼，弃去”。“明年而尚絅物故，予不复作诗”。“登第后，幸与天下名士读书翰林，乃留意学诗，未几有感，遂不竟学，后虽滥竽词职，之后时应人之求，有所述作，终不能工也，故俱不存稿”。《柏斋集》十一卷，只有最后一卷是诗。可知何塘长于文而拙于诗，其诗流传远不如其文之广。在那个信息极不发达的年代，即使刻意去寻找一本诗词集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无独有偶，《东皋诗余》中也没有收北宋时如皋大词人王观的词。王观有《冠柳集》，但早佚。直到光绪年间，冒广生根据《花庵词选》《乐府雅词》《草堂诗余》等书才重新辑了《冠柳集》。

汪之珩在《东皋诗存·凡例》中说：“是编缀辑遗亡，甚费搜索，余家僻处海滨，囿于耳目，挂一漏万，知所不免。吾皋名宿藏书不少，尚冀不吝什袭，陆续邮简，勳成胜事，发潜彰隐，不独鄙人叨光矣！”汪之珩肯定是存有续编之念的，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书还没有开雕，他就患急病去世了。

崇川往事

## 20世纪50年代 南通学校的 劳动教育

◎程太和

党的教育方针代表着国家教育工作的战略指向，为制定各项教育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。1950年，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《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》中强调，要坚持“为工农服务，为生产建设服务”的教育方针。为工农服务的教育，在教育方法上要联系群众、联系生产生活实际；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，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重视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和习惯。1953年，中共中央确定了“整顿巩固、重点发展、提高质量、稳步前进”的教育方针。

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自50年代中期起，南通各学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劳动教育被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重点，学校重视对学生加强基本生产技术教育，并开设劳动课程，积极组织农村中、小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等。南通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成立了生产劳动委员会，把学生分成31个劳动小组，种田17亩，饲养猪羊鸡鸭鹅，向学生提供了部分菜金。1957年6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下达文件指出，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，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，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学校。1958年，南通中学生组成暑期工学团，中、小学勤工俭学活动全面展开，在校内兴办各种工厂。1958年上半年，市区15所中学，学生总数为1.44万人，除少数生病体弱者外，全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，达23.45万余劳动日，到8月5日止，各学校自办工厂（场）和作坊共56家，农场13家，钢铁冶炼土高炉20余座，饲养猪132头，鸡、鸭、兔291只。各校试制、装配、加工的工农业产品达194件，技术革新53项。半年时间，各学校与50家工厂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、31个农业社取得固定联系，让学生到生产一线学工学农。各学校支援农业生产，大搞积肥造肥，共造肥16.10万担，挖土3.58万方，植树25.43万棵。1958年8月16日，在全省勤工俭学展览会上，南通馆共分5个部分，着重介绍了南通专区中等以上学校参加生产劳动及勤工俭学的情况，同年8月17日，在南通专区勤工俭学展览会上，设总馆、分馆、农业中学馆3部分，共有18室，展出图表和实物2000余件，介绍勤工俭学的开展过程及其收获。同年11月，教育部、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展览会，南通市及南通专区又将学生技术革新、发明创造的成果，送去参展。3次展览会上所反映出来的成果，受当时大气候影响，带有夸大失实的成分，但同时它也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有意义的探索。